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项目编号：11YJA790025）



教育金融抑制 理论、指标与应对

Educational Financial Repression
Theory, index and response

窦尔翔 眭 悅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项目编号：11YJA79



教育金融抑制 理论、指标与应对

Educational Financial Repression
Theory, index and response

窦尔翔 眇 悅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金融抑制:理论、指标与应对/窦尔翔,眭悦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

ISBN 978 - 7 - 301 - 23213 - 2

I . ①教… II . ①窦… ②眭… III . ①教育经济学 - 金融抑制 - 研究
IV . ①G40 - 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2486 号

书 名: 教育金融抑制:理论、指标与应对

著作责任者: 窦尔翔 眇 悅 等著

责任编辑: 郝小楠 王 律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3213 - 2/F · 374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em@pup.cn QQ:552063295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经管图书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17.75 印张 304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教育金融抑制：理论、指标与应对》

著作团队

组 长：窦尔翔

副 组 长：眭 悅 刘宇希

撰写组成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王丽静 胡中原 张 宇

前　　言

一、本著作的定位

教育金融制度创新、教育金融抑制问题、教育金融工程分别是教育金融研究的三个重要主题,构成了教育金融研究的“三部曲”。

《教育金融制度创新》已经在 2012 年 2 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部曲”主要告诉读者教育金融制度已经超越了传统“助学贷款”的高度,将微观的学生贷款行为上升到“人力资本积累方金融”的高度。这个高度所带来的创新包括:

其一,揭示了“学生”的本质。认为“学生”在本质上是“人力资本积累者”。这样,才能促使人们明晰地将学习行为看作是一种投资行为,才能鼓励现实中的“非学生”也加入到人力资本积累中来,也才能促使所有的积累者重视“处处留心皆学问”,而不是囿于课堂范围的学习。

其二,将股性合约引入投融资双方。人力资本积累是一个存在风险的投资行为,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风险会发生在哪个投资对象身上,但是就整体来看,这种风险的发生是一定的。因为国家会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这也可以说国家出于对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存在风险的考虑,因而投资者可以采用投资组合的方法来消除“非系统性风险”,从而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内。这种“股性”、“组合”投融资技术的引入既在客观上考虑了教育投资的风险性,又巧妙地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相反,“助学贷款”合约对学生求学风险的关注与管理比较粗糙,其规模有限、坏账率居高不下、缺乏增值服务等结果就是极好的佐证。

其三,将学生求学条件的获得与家庭的贫富分割开来。尽管由于血缘关系的存在,父母支持子女读书是天经地义的事;同样由于“求学”具有外部效应,国家提供财政支持也是合理的。但从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看,“求学”归根到底首先是“求学者”个人的事。《教育金融制度创新》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以个人未来的现金流作为支撑向市场融资,可以使投融资双

方将人力资本积累条件的实现与学生的态度、偏好、潜能、努力挂钩。这样,可以筛选出适合成才的学生进行重点支持,也可以引导学生寻找自己的潜能,并与社会需求挂钩。更加有意义的是,原来由于财政紧张、家庭贫穷、教育资源不均衡等所造成的失学与“隐性失学”问题有了解决思路,这将极大减少“人资源”的浪费。

如果说《教育金融制度创新》是对教育金融理念的创新,那么《教育金融抑制》则是对制度创新需求的调研,这是教育金融研究的“第二部曲”。

制度变迁建立在制度需求之上,包括国家这一“系统性需求”与市场各个主体的“非系统性需求”。当然,要获得客观的需求数据,其前提是被调研者理解什么是教育金融制度创新。可惜的是,关于产业特征如何决定金融供求的研究还不够系统,自然人金融更是只停留在债性合约的基础上。这导致了无论是从国家层面来看,还是从市场个体层面来看,都缺乏对股性成分是否可以引入“学生金融”的认识与思考,从而造成了“强制性金融抑制”与“诱致性金融抑制”,尽管在实践上已经存在股性教育金融的原型与因子。

理想的调研将从含有股性教育金融制度的教育筹资制度的参与者中间展开。总体上来说,这些制度参与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人力资本被投资对象,即学生和家长;另一类属于除学生与家长之外的人力资本积累利益相关者,比如,学校、政府、企业、银行、股性投资者、人力资源公司等。

调研学生的必要性在于该制度与其教育资金及其增值服务的获得密切相关;调查家长的必要性不仅仅在于引入外界资金可以减轻家长的负担,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家长作为以血缘为纽带的“控股人”应当有“增值扩股”的意愿才行。

调研学校的必要性在于,一方面股权的介入不仅可以扩大学生规模,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增值服务,替学校分担了部分力不能及的负担,另一方面股性合约使学生与投资者的利益捆绑起来,从而使学生获得了更大的谈判能力,增加了作为学校谈判对手的砝码;调研企业的必要性在于股性合约的介入一方面能为市场培养出更加符合需求的人才,另一方面也类似地增加了学生作为劳动力买方的谈判砝码。

调研政府的必要性在于股性合约的介入不仅仅使学生多了一条资金来源,而且还通过增信作用扩大了传统教育资金的规模,通过信号引导提升了传统教育金融的效率,从而相当于帮助政府甚至代替政府生产了公共产品。

调研股性投资者是所有调研中最基本的,他们正是学生教育资金的提供者。事实上,在很多创新投资者看了《教育金融制度创新》之后,都希望我能了解学生是否需要这类资金。在国内投资品种稀缺、投资环境不理想的条件下对学生进行投资,他们动力还是很大的,何况他们之中不乏热爱教育、奉献教育者。他们所关心的,更多的是市场需求和政府的监管。

不仅如此,股性投资者还希望能够构建投资者与学生之间的投资模型,这样教育金融制度进入第三阶段——教育金融工程阶段,这是教育金融的“第三部曲”。目前,教育金融工程的研究框架已经完成,内容写作已经过半。总体来说,教育金融工程的核心与难点是学生的估值问题,这会将人力资本估值问题推进到研究的前沿。

二、典型数据

关于教育金融抑制的现状,我们做了大量的问卷调查,同时也在媒体平台上搜集了大量典型的数据,这里摘其一二与大家分享。

1. 关于教育理念问题

教育是全凭兴趣,还是要考虑社会需要?教育是一种投资还是一种消费?教育是“国家崛起”,还是为了自己的名利?2007年的一份调查部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2007年在重庆7所大学开展的调查表明:选择“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好工作”、“有车有房的现代白领生活”以及“较高的权势和社会地位”等现实功利目标的人数高达44%。其中,选择“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好工作”的占到30%以上;家长的选择也与大学生们的选择特点基本相同,现实功利和自我利益目标成为父母为孩子选择上大学理由的首要取向,占49%。而且,年级越高,首要取向就越趋于现实功利和自我利益。大一年级占比为32%,到大四时就逐级增长到58%。参与调查的西南大学某位老师认为,刚踏进大学校门时,同学们大多有远大的目标,崇高的理想。然而随着对大学认知的不断增强,以及临近毕业时越来越感到严峻的就业压力,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就很容易随着年级的增高而趋于现实功利和自我利益。如西南大学的一位同学,在大一刚入校时,立志做一名研究地质地貌的科研工作者,并准备在本科毕业后继续深造读研究生。但到大三时他发现,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研究生毕业后可能还找不到现在本科毕业时的工作,加之家里经济压力大,所以他决定放弃考研,先找一个中学教职,以后有机会再继续深造。这位同学上大学的理由也就由大一时的“为文化传承和科

学研究事业贡献力量”变成了“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好工作”。^①

有人认为,大学生作为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理应对未来充满了理想与信念、激情与冲劲,在他们上大学的理由趋于现实功利的背后,其实是大学生对现实的屈从与无奈,尤其是面对巨大就业压力的妥协。实际上,大学生的选择无可厚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毕业生必须自力更生,接受市场选择的考验。

2. 教育资金的匮乏

教育资金匮乏是所有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关键是看通过什么制度去解决。在美国,征信体制十分健全,学生的资金缺口可以通过信用贷款去弥补。在我国,助学贷款的力度不够大,导致家庭负担过重,教育资源质量下降。以下例子尽管不是普遍现象,但是足以说明我们必须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学生金融创新。

海南新闻网 2006 年 6 月 23 日消息:紧张的高考终于结束了,山西省太谷一中理科考生陈力(化名)估出 600 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陈力的父亲——榆社县西马乡新村 43 岁的陈东生(化名)服毒自杀。记者采访时,陈东生的亲人和乡邻都认为,他是不堪承受儿子读大学的经济重负才走上绝路的。^②

6 月 21 日,记者走进这个悲情笼罩的家庭,只要提及父亲,陈力就会泪流满面。他说:“父亲是因我而自杀的,早知如此,我宁愿不考大学,守着父母在家务农。我就是考上大学也不想上了。因为我们兄妹几个上学,家里欠了两万多元外债,现在父亲走了,我是长子,我得扛起这个家,得把弟弟妹妹抚养成人。”

陈力是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太谷县一中理科班上学。当年的高考并没有给他造成太大的压力。高考结束,他估了 600 分。6 月 12 日,陈力的第一志愿报了西安交通大学。陈力在为从小就萦绕心头的工程师梦想有望实现而兴奋,父亲陈东生却越来越少言寡语。据陈力的母亲后来说,他总在埋怨自己没本事,连孩子的学费都没办法凑。一说这些,他总会唉声叹息,愁眉紧锁。

根据乡亲们得出的结论,陈力父亲自杀的表象原因在于读大学经济成本太高,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消息称,在吉林,平均每个大学生一年的费用为 11 800 元,而 2004 年该省农民人均纯收入

^① “高校传出的质疑声:上大学到底为什么?”新华网重庆频道,2007 年 05 月 17 日。

^② “争气儿子高考估出高分,贫穷父亲绝望自杀”,《山西晚报》,2006 年 06 月 24 日。

为3000元,也就是说,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4个农民一年劳作。吉林省研究中心对该省农安县某镇高中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中,竟有28.7%的学生“害怕升入大学”,原因是“家庭负担不起上大学的费用”。

诚然,动辄几千元的收费,对一个城市中等家庭来说,也许不算很重的负担,但对于城市的不少贫困家庭,以及农村的大多数家庭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陈东生之死,似乎又一次使高校的高额收费与农村贫困的矛盾集中地幻化为一场令人心酸的悲剧。

然而,进一步深入分析可知,大学如果不收费的话难道都需要靠政府拨款吗?政府又有这么高的财力吗?农村贫困很复杂,恐怕也不是一年两年能解决的问题,难道只能等待农村孩子辍学,甚至通过父母自杀来表达愧疚吗?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当然有,但是这需要理论研究者的创新思维,需要当事人的创新尝试。唯有如此,才能改变“寒门再难出贵子”的预期。

3. 教育效率问题

教育效率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可以指教育是否能够让具有主观教育意愿的人都能接受教育,可以指以最低的成本挖掘出某个人潜能的人,可以指是否能将一个人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人,等等。随着大学生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依据他们认为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教育效率。我们通过川北一对父女关于上大学的“谈判”来感知一下家长对大学教育效率缺乏信心的程度。

当许多学生准备迎接大学生活时,家住川北槐树店路的玲玲,却在为上大学的事和父亲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谈判”。虽然拿到了成都某高校的本科录取通知书,但玲玲的父亲固执地认为“读书无用”,他宁愿出钱资助玲玲做点小生意,也不愿“扔几万学费进去打水漂”。^①

女儿喜欢读书的理由是:“我非常爱读书,喜欢泡在图书馆里。书本打开了我的眼界,提高了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读大学,才能让自己更有修养、更有层次,大学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我不想成为只会做小生意的农村人,不想过父亲那种思想封闭、眼界和层次低,没有任何精神追求样的生活。”

尽管“从小到大,父亲很爱我”,“家庭经济条件不错,不缺上大学的钱”,但玲玲的父亲把读大学比喻成一个“肯定会失败的投资”。他掰着手指头给《成都商报》记者算了笔账:大学四年学费加生活费肯定需要8万,

^① “女孩考上大学父亲不让上,称捡垃圾比读书强”,《成都商报》,2013年09月01日。

如果高中一毕业就开始打工,四年至少可以赚8万,这样一来一回就是16万。这16万都可以拿去投资个房子做首付,或者直接开个店做生意也能赚钱。可是拿去读大学,毕业后也许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一个工作每个月就两三千元,又要四五年才能赚回这16万。“咋算都划不来。”玲玲父亲进一步举例说:“捡垃圾都比读书强,我们门口捡垃圾的每年都能赚两三万,很多大学生出来都赚不到。”

显然,玲玲父亲来衡量教育投资具有理性的模型。如果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难以找到工作,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那显然不如去拣垃圾。事实上,最近几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699万人,再创新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认为,今年就业形势严峻,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没有找到工作。玲玲父亲其实表达了对现代大学教育效率的担心。这些引发了我们对教育实施过程中究竟存在哪些问题的反思。

很显然,大学生规模太大是对所存在问题的最表象的判断。究竟要培养多少大学生,必须联系国家的产业需求而定,就目前总体上处于“中国制造”的产业阶段来说,高职所培养的操作型人才、应用型人才才是主流;造成大学生失业的本质原因在于大学生培养“标准化”、“批量化”,缺失个性化培养技术。总而言之,当今“后高中”教育,既缺乏足够的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也缺乏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而是过度“传授大道”,造成了“人才”的同质化、低品化。

三、致谢

感谢在我人力资本过程中为我提供物质资助、精神鼓励、增值服务的所有智者!感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软件与微电子学院为我提供的宝贵的学习和研究平台!感谢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心血的郝小楠老师!感谢我爱人王洪艳给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女儿窦蓝熙给我的快乐,你们为这本书作了间接贡献!

窦尔翔于北京大学中关新园

2013年9月1日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金融抑制理论演化的逻辑	(13)
第一节 传统金融抑制理论	(13)
第二节 金融抑制理论第一层次的拓展	(22)
第三节 金融抑制理论第二层次的拓展	(28)
第二章 学生金融抑制的产生	(35)
第一节 学生资金需求的特征	(36)
第二节 学生资金需求的主观因素	(50)
第三节 学生资金供给的特征	(56)
第三章 教育金融抑制的外部致因状况	(65)
第一节 国家财政教育供给	(66)
第二节 公益教育资金的供给状况	(73)
第三节 家庭教育资金供给的状况	(81)
第四节 教育助学贷款制度	(88)
第五节 教育基金制度	(96)
第四章 教育金融抑制效应的考察	(104)
第一节 政府的行为效应考察	(104)
第二节 社会捐赠的行为效应考察	(113)
第三节 银行的行为效应考察	(120)
第四节 家庭的行为效应考察	(125)
第五节 学生的行为效用考察	(133)
第五章 教育金融抑制:调研与刻画	(138)
第一节 学生调研问卷的设计思路	(138)

第二节 基于调研结果的实证分析	(144)
第三节 教育金融抑制程度	(155)
第四节 教育金融抑制指标体系的初建	(163)
第六章 股性教育金融制度创新的联动效应	(172)
第一节 股性教育金融制度创新	(172)
第二节 股性教育金融制度的联动效应	(183)
第三节 联动效应的验证及预测	(193)
第七章 教育金融抑制解除效应预测	(199)
第一节 学生与家庭行为效应的改观	(199)
第二节 教育环境的改善	(209)
第三节 宏观效应的预测	(217)
第八章 分成制对高校教育金融的深化	(236)
第一节 高校教育资金流动机制	(236)
第二节 高校教育资金现状分析	(245)
第三节 分成制对高校教育金融的拓展	(253)
第四节 分成制优化教育资金行为模式	(260)
参考文献	(265)

导 论

所谓教育金融抑制,是指作为教育需求方的学生所面临的金融抑制问题。它主要研究学生由于缺乏有效的融资工具而导致教育资金短缺和教育效率低下的困境。从合约的普适性来讲,学生融资也应当可以使用股性合约,而这正是造成目前学生金融抑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研究背景

教育资金短缺以及培养效率低下的状况不仅要求通过金融方法增强教育资金的可得性,还要求设法改善教育机制,提升教育效率;而国际竞争局势与国内人口红利形势则对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紧迫要求。

(一) 国际、国内形势要求中国必须重视创新人才培养

2011年2月14日消息,日本内阁府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 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 044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很多人都在预测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必会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亿万富翁投资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曾早在2010年路透社主办的一个交流会上发表讲话说,无论是从经济增长速度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上看,还是从经济规模对世界经济发挥的影响力看,中国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自然不是坏事,那是中国人的大国崛起之梦。然而,这种崛起,也给中国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压力。

第一,一旦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必然要担当领头羊的责任,那就是创新人才与科技的发展。中国将面临的是独一无二的首创,而不是尾随他国之后的模仿。事实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提醒我们必须韬光养晦,既要处理目前粗放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难题、发展非均衡问题,还要为科技超越进行创新文化、创新教育等创新体系的构建。

第二,中国“未富先老”的严峻形势要求中国要设法抓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中国具有丰富劳动年龄人口的现象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

消失,在消失初期,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中国将会得到所谓“第二次人口红利”。而发挥储蓄资金效率的关键是中国需要依靠高附加值的科技发展。

第三,中国将要面临将中国视为经济假想敌的科技压制和科技挑战。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并不甘心于中国如此快速的发展,次贷危机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汇率施压,以及美日所支持的南海、东海挑衅,都是依赖于科技实力对中国进行压制的表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界、产界、科技界对以往的人才培养和创新模式进行了反思,欲发挥最根本的人才软实力,衔接创新链条,形成研发链(基础—技术—推广)、产业链(产品一小试一中试一产业)、市场链(商品—流通—销售—服务)的首尾呼应和系统集成。中国必须迅速反应,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下大功夫。

第四,中国还面临世界发展规律拐点的挑战。美国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兼新闻记者丹尼尔·奥特曼在他的《十年后》一书中对十年后和数十年后的未来进行了宏观预测。按照丹尼尔·奥特曼的预测,再过30年到2041年,中国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但丹尼尔又说,对“到2050年中国经济将比美国更快发展”表示怀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网上交易和物联网的发展,“人”将取代商品和金融成为构筑集成器“中心”(Hub)的主要变数。企业家、投资者、专职人员、退休者将向犯罪率低、气候适宜、生活水平较高且政治稳定的国家聚集,这样的地方将成为“生活方式中心”。如果规律真是这样出现了方向上的拐点,如果中国没能成为这样的“中心”的话,我们将又一次错失“崛起之梦”。而要成为这样的中心,不仅要求创新人才的创新思考,也需要创新人才在各个指标上的创新努力。

(二) 教育资金面临总量和结构双重困境

教育资金分为财政资金、社会捐赠资金、家庭提供资金,以及通过融资获得资金。每一种资金在人群、地区、城乡等主体范围上又呈现差异。

教育资金总量不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个是绝对总量,即教育资金供小于求,或者教育资金供给增长慢于教育资金需求增长。《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自1999年教育改革以来,我国教育资金稀缺性不断增强。在教育改革的前一年1998年,中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额为2949.06亿元人民币,到2010年,中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额增长了4.26倍,达到12550.02亿元人民币。但在同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增加到26.5%,提高了5.30倍,高于教育经费的增长额度。此外,我国高等院校的收费标准从1998年的3000元/年,增加到2010年的6000元/年,翻

了一番。可以估算出我国教育资金需求在这 12 年间,猛增了 10.6 倍。通过教育资金供需双方增幅对比发现,我国教育资金稀缺性程度增加了约 2.5 倍。如果考虑人口增长,我国教育资金需求增幅将更大。

另一个是相对总量,即教育财政占 GDP 的比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国际上财政教育资金投入占 GDP 比例平均水平为 7%,其中发达国家接近 9%,经济欠发达国家投入比例约为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大财政教育资金投入,从 1980 年的 114.15 亿元到 2011 年的 16116 亿元,在 30 年间财政教育投入增长了 141 倍,财政教育投入绝对数额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具体增长情况如图 0-1 所示。但是在 1980—2011 年这 30 年间我国财政教育资金投入占 GDP 比例长期徘徊在 2%—3%,此期间财政教育资金投入占 GDP 比例常有小幅下滑的情况(见图 0-2)。2012 年全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 2 万亿元左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达到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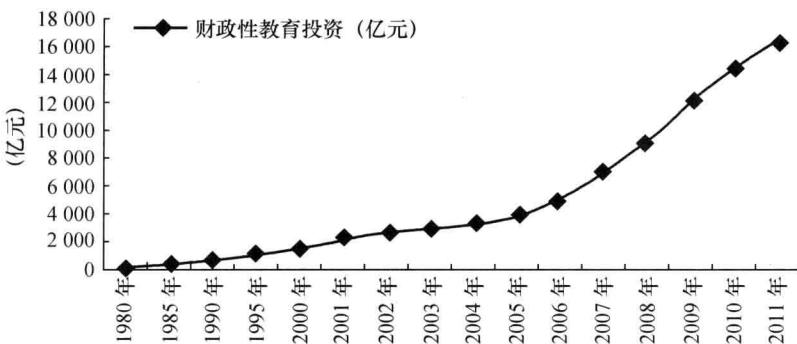


图 0-1 我国财政性教育投资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2010》,《中国统计年鉴 2011》,国家统计局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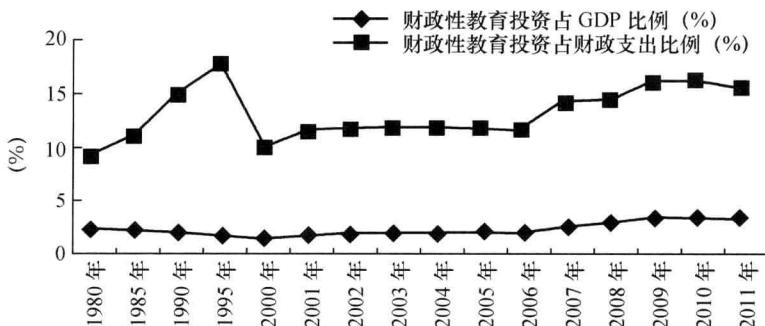


图 0-2 我国财政性教育投资比例

资料来源:同上注。

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和国际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只能勉强达到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财政性教育投资总量不足,刺激高等院校诉诸债务,造成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恶性膨胀。审计署科研所副所长刘力云在接受采访时称:“到 2011 年底全国一共有 1164 所地方所属普通高校存在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金额约为 2634.98 亿元。”^①据国家助学贷款网统计,在 2006 年助学贷款申请人数为 211.1 万人,审批通过人数为 154.3 万人,审批通过率为 73.09%,申请贷款金额 171.6 亿元,银行审批金额 131.7 亿元,资金满足率为 76.66%。就助学贷款实际申请金额来看,已有 40 亿元的差额,申请未通过和未申请的金额缺口则更加巨大。巨额助学贷款申请,反映了学生教育资金紧缺的现状,国家财政教育资金投入无法满足需求。

教育资金结构不合理则体现在四大方面:

第一,教育资金过度依赖财政投入(见图 0-3、图 0-4)。1998 年,我国教育经费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整个教育经费的 69%,在 2009 年达到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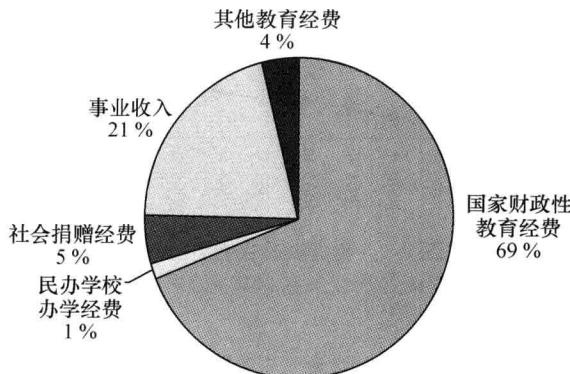


图 0-3 我国 1998 年教育经费构成

教育财政投入占 GDP 的比重究竟应当多高,至今并没有人研究出占比依据。事实上,教育是一种半公共品,它会随着不同历史阶段总体教育水平和不同人的不同教育程度目标以及所处的教育阶段发生动态变化。^②这至少说明,靠提升教育财政的 GDP 占比来提升对教育需求方的资金供给是违反教育资金供给规律的,而且财政支出资源是个硬约束。

^① 审计署. 全国 1164 所地方所属高校负债 2634 亿[N]. 济南日报,2011 年 7 月 4 日

^② 窦尔翔. 教育金融制度创新[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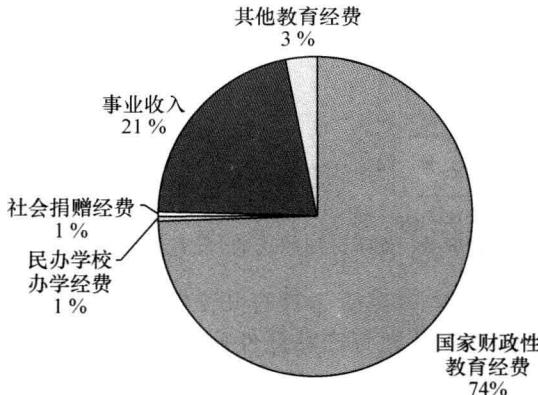


图 0-4 我国 2009 年教育经费构成

第二,不能对学生资金的稀缺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教育由供求双方构成,筹资按照主体不同可以分为:教育供给方(主要是学校)筹资和教育需求方(主要是学生)筹资。显而易见,教育供求双方都会涉及筹资问题。然而,传统的研究几乎是将教育供求双方的筹资问题简单化为混沌的“教育筹资问题”(见图 0-5)。这种简化主要体现在对教育双方筹资的区别和比较不足,这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教育供给方的筹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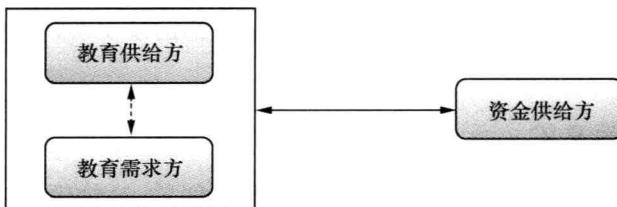


图 0-5 处于混沌状态的“教育筹资问题”

随着教育市场化的深入,中国教育的政府包办模式因为渗入市场因子而渐趋式微。特别是随着就业机制的市场化,教育需求方的选择权逐渐增加,教育的私人收益特征越来越得以强化,从而教育的投资性质也随之更加显化。教育需求方也要面对教育资金的获得问题。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数据说明,学生教育资金的可得性越强,学生教育机会的选择权就越大,学生的教育收益也就越大(见图 0-6)。

由此可见,学生教育资金的可得性的系统研究必将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第三,对金融抑制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资金的有限性上来